



何新文
著

中国赋论史稿

开明出版社

何新文 著

中国赋论史稿

开明出版社



(京)新登字 104 号

责任编辑:秦 琪

封面设计:路 石

中国赋论史稿
何新文 著

*

开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 19 号)

中共湖北省委办公厅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125 插页 2 字数 224 千字

1993 年 4 月第 1 版 199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1500 册

书号 ISBN7—80077—491—0/I·56

定价:5.25 元

目 录

绪 论	中国赋论概观	(1)
一	中国赋论的历史发展	(1)
二	中国赋论的基本内容	(7)
三	中国赋论的价值特色	(12)
第一章	汉代赋论	(16)
一	汉代赋论概述	(16)
二	司马迁的赋论	(24)
三	扬雄的赋论	(28)
四	《汉书·艺文志·诗赋略》	(31)
五	班固的赋论	(39)
六	王充等人的赋论	(42)
第二章	魏晋南北朝赋论	(47)
一	魏晋南北朝赋论概述	(47)
二	曹丕等人的赋论	(55)
三	晋代的赋论	(59)
四	刘勰的赋论	(65)
第三章	唐宋赋论	(73)
一	唐宋赋论概述	(73)

二	白居易的《赋赋》及其他	(83)
三	唐宋笔记、诗话中的赋论	(85)
四	唐宋的赋格书	(91)
五	朱熹对司马相如、扬雄赋的批评	(95)
第四章	金元明赋论	(99)
一	金元明赋论概述	(99)
二	祝尧的《古赋辨体》	(105)
三	吴讷、徐师曾的赋论	(112)
四	王世贞、胡应麟的赋论	(116)
五	张溥的赋论	(121)
第五章	清及近代赋论	(126)
一	清及近代赋论概述	(126)
二	清代前期的赋论	(133)
三	乾隆、嘉庆时期赋论的兴盛	(139)
四	道光、咸丰以后赋论的发展	(157)
五	近代的赋论	(170)
第六章	现当代赋论	(175)
一	现当代赋论概述	(175)
二	现当代的赋学论著	(181)
三	港台的赋学论著	(203)
四	国外赋学论著附说	(219)
	历代赋学要籍叙录	(224)
	《扬雄赋研究》译介	(263)
	主要参考引用书目	(276)
	后 记	(284)

绪 论

中国赋论概观

在中国古代繁荣兴盛的文学园地中，赋是那片最华美绚丽的风景。它“不歌而诵”，韵散相兼，尤以内容上的较多铺陈描写和艺术形式上的唯美尚丽为其基本特征。赋萌生于先秦，始盛于两汉，发展变化于六朝唐宋，延续于元明清，成为我国古代源远流长而又最具有民族特色的一种文学样式。历代赋家驰骋其心智才情于赋的创作之中，留下了成千上万的赋篇，从而使赋与诗、词、曲并称，卓立于民族文学之林，在文学史上占有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

伴随着赋文学创作的兴起，赋的理论批评也继之而生并不断发展。历代的赋论家们，对于赋的创作及其种种艺术特征有过很多的论述，对于赋的渊源与发展变迁的历史轨迹也有过认真的探索。他们比较全面地研究和总结了赋这一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学现象，形成了较为系统的赋论体系，为丰富我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中国赋论的历史发展

本书根据对中国历代赋论的初步探讨，将中国赋论的历史发

展过程划分为六个阶段：汉代，魏晋南北朝，唐宋，金元明，清及近代，现当代。

汉代是我国赋论的发轫期。汉代赋论受到当时儒学作为学术思想主流指导文学批评及追求功利风气的影响，赋论家如司马迁、扬雄、王充、班固等人，往往用儒家诗教所认定的《诗》的“美刺”价值衡量汉赋，对汉赋提出尚用讽谏的功利要求，而对它唯美欲丽的审美属性缺乏肯定性的认识。正因为如此，汉代赋论家对汉赋多持否定态度，表现出批评“尚用”和创作“唯美”的矛盾。这说明汉代赋论还处于不自觉的文学批评阶段。汉代赋论大多是片断的，散见于历史、哲学等学术著作中，只有扬雄《法言·吾子》、《汉书·艺文志·诗赋略》、班固《两都赋序》等少数几篇内容较为集中的论赋文字。但是，汉代赋论讨论了赋的特点和渊源，涉及了汉赋“靡丽多夸”的艺术特征与讽谏揄扬的思想内容二者之间的关系，也评论了一些重要作家作品；而且两汉赋论活跃，具有探讨、争论的性质。所以，汉代赋论在后代赋论史上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其中，《西京杂记》所载司马相如论“赋迹”、“赋心”之说，尤为东晋以后论赋者所重视。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赋论，较之于两汉，有明显的转变和发展。首先，由于儒家思想的削弱，文学创作及其理论批评摆脱儒家诗教观念和过去学术著作的束缚而独立发展，赋论也不再象两汉那样偏于讽谏、颂扬的政治功利判断，而是重在赋文学创作艺术形式技巧及作家才情品性等主观因素的分析评价，注意对赋体创作内部规律的探讨，开始体现出赋学批评的自觉意识。如关于赋的本质特征，曹丕在西汉扬雄“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的基础上，明确提出“诗赋欲丽”，以一个“丽”字突出赋的特点，而摒弃了“丽以则”、“丽以淫”的儒家文学标准。此后，陆机相对于“诗缘情而绮靡”，提出“赋体物而浏亮”；沈约提出

“相如巧为形似之言，班固长于情理之说，子建、仲宣以气质为体”；刘勰说“赋者铺也，铺采摘文，体物写志也”，都是真正从艺术的角度在探究赋的特质。其次，魏晋南北朝赋论比较具有理论色彩和系统性。这个时期中，出现了不少单篇的论赋专文，如左思、皇甫谧两篇《三都赋序》，傅玄《七谟序》，还有挚虞《文章流别志论》中的论赋部分等。刘勰《文心雕龙》的《诠赋》和其他篇中的论赋文字，更是从理论上较为全面、系统地论述了赋的体制源流、历史发展与创作原则，评析了楚汉魏晋的赋家赋作，建构了自己的赋论体系。

唐宋是赋论史上的缓慢发展期。这一时期的赋论，没有专门的文著，大都散见于各类文集、史籍、笔记及新兴的诗话著作中。赋论内容，主要集中在对汉魏六朝赋和唐宋律赋的评价方面，并与当时文学创作、批评领域中不同倾向的论争有着密切的联系。从唐初史家及唐代古文运动先驱者对汉魏六朝赋风的批判，与杜甫、韩愈、柳宗元、皇甫湜等的反批判；到宋代王禹偁、姚铉等人倡导古体、排斥律赋与孙何等人对律赋取士的充分肯定，大致可以见出唐宋时期两种不同赋论观的论争情形。此外，白居易对赋的政治功利作用的强调，朱熹以道学家的道德标准及功利主义态度对司马相如、扬雄赋的批评，秦观、洪迈等对律赋的研究，也是唐宋赋论中值得注意的现象。

金元明三代尤其是元明时期的赋论，在某些方面又有所发展。金朝重律赋取士，但弊病极多，金、元之际的刘祁就对此提出过批评。王若虚对于赋家模拟复古的习气和庾信《哀江南赋》用典不当的现象，也发表过不囿于传统的看法。元代祝尧的《古赋辨体》，是刘勰《诠赋》以后最有价值的赋学专书。他注重辨析赋的体制源流，颇能道出楚汉至唐宋赋的演变发展轨迹，又开后来古赋、俳赋、律赋、文赋四分法先河。祝尧论赋推重古赋而轻俳、律、

文诸体，虽不无偏颇之处，但他提出“辞、情、理”的评赋标准，要求赋家正确处理这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则是对刘勰赋论的进一步发展。明代的赋论，与当时复古与反复古两种文学思想的论争相联系。从整体上看，反复古派破多立少；复古派赋论虽然提出了“唐无赋”，“赋盛于汉，衰于魏，而亡于唐”之类偏激的论点，但他们对楚汉古赋有较深入的评论。所以，明代赋论较有成就者，还是复古派或近于复古派的徐师曾、王世贞、胡应麟等人。王、胡二人在所著诗话中，以较多的篇幅集中地论赋，如《艺苑卮言》卷二、卷三和《诗薮》杂编卷一。这相对于此前笔记、诗话中偏于记事而又零星片断的话赋文字，显然有较大的变化和进展，它实际上已预示着一个赋话兴盛时代的到来。

清及近代，是我国古代赋论的总结和繁荣时期。一方面，清人诗话、四六话、文话、笔记、学术著述中，仍包括有相当比重的话赋内容；另一方面，大量独立的论赋专文和赋话著作相继出现，如程廷祚《骚赋论》、李调元《赋话》、浦铣《复小斋赋话》、王芑孙《读赋卮言》、林联桂《见星庐赋话》、刘熙载《赋概》等。各类各样丰富繁多的论赋文、著，汇集、总结了两汉以来的赋论遗产，同时也反映了清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和赋学观点，构成了具有总结性和集大成意义的一代赋论成果，将古代赋论的发展推向了高峰。赋论发展到晚清近代，文学史家刘师培和著名学者章炳麟等，仍承传统之说，论赋止于隋唐以前，对唐宋以后赋几乎未曾涉及。真正从理论上系统、全面地科学研究绵延二千余年的赋文学创作的任务，历史地落在现当代赋论家肩上。

现当代，是中国赋学研究的新时期。近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入，使现当代赋论与传统赋论区别开来，走向了科学化、现代化的道路。现当代的赋学研究，在批判继承传统方法的基础之上，用现代科学方法和马克思主义的

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广度和新的角度进行探讨研究，取得了崭新的丰硕成果。“五四”前后问世的中国文学史著作，大都将赋纳入了论述范围，如王梦曾《中国文学史》、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陈钟凡《中国文学批评史》，以及鲁迅《汉文学史纲要》、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等等；同时也出现了一些赋论专著，如陈去病《辞赋学纲要》，丘琼荪《诗赋词曲概论》、金瓶香《汉代词赋之发达》和陶秋英《汉赋之史的研究》。还有朱光潜《诗论》对赋的艺术性、赋与诗的同异及赋对于诗的影响的论述，均是前人未发的卓见新论。全国解放以后尤其是一九八零至一九八九年期间，大陆赋学研究者发表了数以百计的赋学研究论文，问世的专著也达十部之多。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马积高、高光复的赋史研究，姜书阁、龚克昌、刘斯翰、曹道衡、万光治等对汉魏六朝赋的研究。马积高的《赋史》，系统而完整地描述了先秦至清代赋文学创作的历史发展过程，是当代最有价值的辞赋通史。

与八十年代国内赋学研究的繁荣大致同时，近十年来，台湾、香港地区的赋学评论研究也取得了十分引人注目的成就。台、港学者撰写的赋论著作近二十种。如何广棧《汉赋与楚文学之关系》，张清钟《汉赋研究》，张书文《楚辞到汉赋的演变》，李兆兰《汉赋初探》，简宗梧《汉赋源流与价值之商榷》、《司马相如扬雄及其赋之研究》，张正体、张婷婷《赋学》，许东海《庾信生平及其赋之研究》，何沛雄《汉魏六朝赋论集》，陈韵竹《欧阳修苏轼辞赋之比较研究》，曹淑娟《汉赋之写物言志传统》，廖国栋《魏晋咏物赋研究》，以及高桂惠《左思生平及其赋之研究》、段铮《江淹生平及其赋之研究》等等。台、港地区的赋学研究，属于中国现当代赋学研究的一部分；但缘于地理环境、学术氛围等多种因素，台、港学者尤其是新一代赋学研究者，在论述内容、学术

观点、研究方法诸方面均有自己的特色，自成一番景象。

这里还应当提到的是，在现、当代，中国古代赋文学的评论研究，也引起了日本及欧美等西方汉学家的广泛注意。英、法、德、美、荷、加、日等国学者，都有关于中国赋的译本或论著问世。其中日本铃木虎雄、中岛千秋，美国康达维等对赋史及汉赋的研究，尤具代表性。铃木虎雄的《赋史大要》，是现代赋学领域最早问世的一部系统的赋史著作。著者将赋史的发展分为六个时期：第一为骚赋发生成立时期，自屈原、宋玉前后至汉文帝、景帝之时；第二为骚赋变化为汉代辞赋时期，自汉武帝至魏晋之交，即昔人所谓古赋时代；第三为晋宋至唐初，昔人所谓俳赋或骈赋时代；第四为唐及宋初，昔人所谓律赋时代；第五为宋代，昔人所谓文赋时代；第六为于时法中杂入制艺文句法存在之时期，清代属之，是类虽亦可视为文赋之别体，然未闻昔人对之而特有所命名，可假称之八股文赋。铃木虎雄将赋的发展历史如此划分，或许不尽合理，但却能大致显出赋的变迁及各个时期赋的基本特色。此著以“赋史”名书，所论内容当然偏重于赋的发展线索；但它对赋的艺术特质如结构形式、叙法句法、对偶声律、押韵规格等，也有分析介绍，对各时期赋家及其作品则以创成一代特色之进展者为主旨给予举例简述，故此书又兼有“赋学”的某些特质。《赋史大要》早在三十年代就完成问世，全书近二十万字，以较为充实的内容描述了中国赋史的发展及体制特点，肯定了赋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在现当代赋论史上，《赋史大要》开赋史、赋学研究专著之先，其首创之功值得重视。而且洋洋大观的赋史大要，竟最先出自一位异邦学者之手，实在值得敬佩。

二、中国赋论的基本内容

赋论的历史源远流长，论及的内容相当广泛丰富。概而言之，中国赋论的内容，主要论述了以下几个基本问题。

第一、论赋的文体性质及其范围

关于赋的文体性质，历代论赋者都颇为注意。但自汉至今，众说纷纭，难有定论。归纳起来，大致有这么几种解释：1、《汉书·艺文志》说“不歌而诵谓之赋”；2、班固《两都赋序》“或曰赋者古诗之流也”；3、刘勰《文心雕龙·诠赋》云“赋者铺也，铺采摘文，体物写志也”；4、郭绍虞《汉赋之史的研究序》说“赋之为体，非诗非文，亦诗亦文”。现代学者多从第3或第4说，马积高《赋史》则以第1说为“探本之论”，力主“赋是一种不歌而诵的文体”。

关于赋的范围，主要涉及与“楚辞”和“七”体的关系。汉人辞赋连称，司马迁、《汉书·艺文志》均称屈原之作为赋。后代多有辞赋连称者，但也有明确区分楚辞与赋为两种不同文体者，如刘勰《文心雕龙》中有《辨骚》篇，又有《诠赋》篇，肖统《文选》也将赋与辞分为两类，胡应麟《诗薮》以为“骚与赋句无甚相远，体裁则大不同”，程廷祚《骚赋论》力辨骚与赋之不同。自枚乘《七发》以后，仿作甚多，遂有“七”一体，古代学者常将“七”与赋分别开来，今人则大都将“七”体划入赋的范围。如马积高《赋史》认为，赋“还以铺叙描写较多为其特色，”有些作品虽标为文、“移文”或“论”、“七”，或以意命篇，以其为韵文，并且有汉以后赋多铺张描述的特点，也应该算作赋或赋体文。

本《史稿》认为，赋“不歌而诵”，亦诗亦文，尤以内容上的较多铺陈描写和艺术形式上的唯美尚丽为基本特征；楚辞是屈原等人创造的具有楚国地方色彩的抒情诗，自应属于诗之列，没有必要再置于赋的范围之内。故本书所述赋论，不包括专论楚辞者。

第二、论赋的起源

关于赋的渊源，历代论赋者提出过不少的说法。1、源于《诗经》说。自班固《两都赋序》云“或曰赋者古诗之流也……抑亦雅、颂之亚也”以后，这种观点一直占有主要地位，如左思、皇甫谧、挚虞、刘勰、颜之推，直到唐宋以后乃至现当代的许多批评家都继承此说，如朱光潜《诗论》云“就体裁说，赋出于诗”。2、源于《楚辞》说。班固《离骚序》说屈原其文“弘博丽雅，为辞赋宗”，刘勰《文心雕龙·诠赋》云“及灵均唱骚，始广声貌。然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后世承袭这种说法者甚多，如宋祁、祝尧、刘熙载等，都以为“骚为赋之祖”。3、源于战国散文说。章学诚《校讎通义·汉志诗赋第十五》云：“古之赋家者流，原本诗骚，出入战国诸子”；刘师培《论文杂记》说：“诗赋之学亦出行人之官……欲考诗赋之流别者，盍溯源于纵横家哉！”今人论汉赋者，亦有发挥此说的。4、源于隐语说。刘勰《诠赋》说“荀结隐语，事数自环。”清王闿运《湘绮楼论文章体法》则提出：“赋者，诗之一体，即今谜也，亦隐语，而使有人谏喻。……庄论不如隐言，故荀卿、宋玉赋因作矣。”朱光潜、刘斯翰等承此说。5、“赋起于情事杂沓”说。刘熙载在《艺概·赋概》中首次提出，此说注意到了社会生活对赋的产生的重要影响。古代论赋者多方面探讨过赋的渊源，但往往只注意从某一方面去寻根索源，缺乏整体观照，唯有刘熙载较为全面。

第三、论赋的体制类别

赋兴起之后，赋的体制颇有变化，如汉代既有承袭楚辞的骚

体赋，又有新兴的散体大赋；南北朝产生了讲求对偶声律的骈赋；唐宋出现了用于科举考试而有规律限制的律赋，也有虽大体押韵而散文单行的文赋。古今赋论对此进行了研究。元祝尧《古赋辨体》每用“古赋”、“俳体”、“律体”、“文体”之名，明吴讷承之，亦有“古赋”、“律赋”之称。徐师曾则明确将赋分为古赋、俳赋、律赋、文赋四类，大抵以楚汉赋为古赋，“三国两晋以及六朝再变而为俳，唐人又再变而为律，宋人又再变而为文。”徐氏之说影响甚大，后人多承袭之。但马积高《赋史》则不以为然。他将赋的基本体制分为三大类，即由楚歌演变而来的“骚体赋”，由《诗》三百篇演变而来的“诗体赋”，和由诸子问答与游士说辞演变而来的“文赋”；而认为徐师曾古赋、俳赋、律赋、文赋（《赋史》称为“新文赋”）的区分，仅仅反映了“文赋”的变化情况。此外，《赋史》还将唐代出现的“俗赋”列为赋的一种类别。

第四、论赋的创作原则与写法技巧

司马相如论“赋迹”、“赋心”，扬雄说“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可以说是对作赋原则的最早论述。后代赋论颇多这方面的内容，如左思论“依本”、“本实”，刘勰论“立赋之大体”，祝尧论如何赋古、赋今、赋事、赋物，王世贞论“作赋之法”，刘熙载论“赋不厌奇”、“赋之妙用莫过设字诀”和“赋兼叙列二法”，许多赋论家论“学古”与“拟古”、继承与创新的辩证关系等。清人赋话中，如朱一飞《赋谱》、汪廷珍《作赋例言》之类，其内容则主要是论律赋作法技巧的，诸如审题、构思、谋篇、练句、结局、用韵、笔意、裁对、写情、绘景等等，无不涉及，其中无不精当之论。

第五、论赋的思想内容与艺术特征

历代赋论都重视赋的思想内容，对赋提出了“讽谕”、“揄扬”、“铺采摘文，体物写志”、“事与情之兼至”等许多思想内容

方面的要求，并从这方面进行了认真的总结和评论。对于赋的艺术特征，也有多方面的探索，如汉人所谓“虚辞滥说”，“靡丽多夸”，“侈丽宏衍”，“文丽而务巨”；六朝人所言“赋体物而浏亮”，“引而申之，故文必极美，触类而长之，故辞必尽丽，然则美丽之文，赋之作也”；明清人所说“材极富，辞极丽，而运笔极古雅，精神极流动，意极高”，“屈子之缠绵，枚叔、长卿之巨丽，渊明之高逸”，“赋取乎丽”，等等。虽各自侧重不尽相同，但都无一例外地提出了“丽”这一特点。可见以赋为唯美尚丽之文体，是古代赋论家的共同看法。这正是赋文学作品最基本的艺术特征。魏谦升《赋品》则以“雅贍、浏亮、宏富、丽则、短峭、纤密、飞动、古奥”八品，论评赋的不同艺术风格。而且，古代赋论家，还提出要做到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统一，如刘勰所云“丽词雅义，符采相胜。文虽新而有质，色虽糅而有本，此立赋之大体也”。

第六、论赋作家

正如做诗人须有诗人的气质，做词人须有词人的心性一样，赋家也须有赋家的才学。前代赋论者认为，要成为赋家，一要才学，一要人品。司马相如论“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已从主观方面提出了赋家要有巨大的艺术想象力和概括能力。后来王世贞说“作赋之法，已尽长卿数语，大抵须包蓄千古之材，牢笼宇宙之态……赋家不患无意，患在无蓄，不患无蓄，患在无以运之”，就是从赋家才学之蓄与艺术表现能力两方面来理解的。刘勰论赋家风格才性，尤其注重才、气、学、习对创作的作用，认为赋家才思迟速、深浅与赋的写作有密切关系。刘勰的论述，是古代赋论之作家论的重要部分，在赋论史上很有影响。清代赋论家刘熙载明确提出“赋兼才学”的观点，说“赋兼才学。才，如《汉书·艺文志》论赋曰：‘感物造端，材智深美’。《北史·魏收传》曰：‘会须作赋，始成大才士’；学，如扬雄谓‘能读赋千首，

则善为之。”又说“才弱者往往能为诗，不能为赋。积学以广才，可不豫乎？”充分强调了才学的重要性。同时，刘熙载又认为：“赋尚才不如尚品。或竭尽雕饰以夸世媚俗，非才有余，乃品不足也。”本着这种既重才学又重人品的观点，前贤论赋评人，得出了不少实事求是的结论。

第七、论赋作品

论析品评赋篇的成就得失、风格特色，是中国赋论的重要内容。司马迁评相如《子虚》、《上林》赋，开赋论史上作品评论的风气之先。后代赋论家进一步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如祝尧、王世贞、张溥等人对汉魏六朝赋作的评品，李调元《赋话》对唐宋律赋佳联隽句的鉴赏，浦铣《复小斋赋话》以“气骨雄健”、“沉郁顿挫”及“清雅”、“清丽”、“流丽”、“圆美”、“精切”、“哀艳”、“秾艳”、“真挚”等词语，评赏赋篇赋句的艺术风格等，均表现了赋论家独到的艺术欣赏趣味。现当代更出现了许多以评论赋家作品为主的赋论专著，将传统的作品论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第八、论赋的功用价值

汉人论赋极重视赋的政治功用价值，要求赋有讽谏、颂扬的作用；但汉宣帝刘询又以为辞赋“小者辩丽可喜”，并有“鸟兽草木多闻之观”，可见他还道出了赋的娱乐与认识作用。魏之曹植与汉人不同，说“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但却马上遭到杨修反对，杨修仍然强调赋在“经国”与人生中的重要地位。汉魏人的功用价值观，对后代赋论影响甚巨，如皇甫谧、白居易、孙何等，都很看重赋的政治作用。但自六朝以降，也不断有人从纯艺术的角度，评论赋的艺术成就。进入现、当代，人们多能以文学和美学的观点评论赋在文学史和美学史上的地位及影响，对赋的功用价值有了科学的评价。

第九、记事与考辨

记载有关作赋的历史资料和赋作者的生平事迹，考辨赋篇真伪存佚和某些词语、难字、名物、典故，也是古代赋论尤其是笔记、赋话著作中赋论的内容之一。前者如《西京杂记》、《世说新语》，浦铣《历代赋话》、李调元《赋话》中的“旧话”部分；后者如王世贞《艺苑卮言》、胡应麟《诗薮》及吴景旭《历代诗话》。这些内容，或对了解前人作赋的社会背景，赋家生活、性格、思想情趣，或对阅读和选注古代赋篇，有参考借鉴作用。

第十、论赋的发展流变

关于赋的发展流变，许多赋论家都有论述。较早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刘勰。他在《文心雕龙·诠赋》中，自觉地“讨其源流”。从“命赋之厥初”起，论到“兴楚而盛汉”，以至魏晋的王粲、左思、郭璞、袁宏等赋家，概述了自赋的起源，到汉、魏、晋的发展过程。此后，祝尧在辨析赋的体制时，认真分析各个时代赋的发展变化情况和代表赋家赋作，勾画了楚、汉、魏、晋、南北朝至唐、宋时代赋发展演变的大致轮廓，实际上已为读者提供了最早的赋文学简史。明代吴讷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补充，又延伸到了元、明时代。而真正意义上的完整的赋学通史，则要由现当代赋论家才能最终完成，如铃木虎雄、马积高等。

三、中国赋论的价值、特色

古代赋论在历代思想文化与文学、学术的特定背景中丰富发展，同时也受到传统思维方式及诗论、文论等文学理论批评的直接影响。因此，中国赋论的价值和特色，也应结合这些方面去分